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精品系列·第一辑

刘东主编

近代中国の知識人と文明



近代中国的 知识分子与文明

〔日〕佐藤慎一 著
刘岳兵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精品系列·第一辑

刘 东 主编



近代中国の知識人と文明

近代中国的 知识分子与文明

〔日〕佐藤慎一 著

刘岳兵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日]佐藤慎一著;
刘岳兵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3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品系列\刘东主编.第1辑)
ISBN 978-7-214-07780-6

I. ①近... II. ①佐... ②刘... III. ①知识分子—研
究—中国—近代 IV. 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7862 号

《近代中国の知識人と文明》

Kindai Chugoku no Chishikijin to Bunmei

Copyright © 1996 by Shinichi Sat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6 by JSPPH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5-253

书 名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著 者 [日]佐藤慎一

译 者 刘岳兵

责任编辑 府建明 张蕴如

装帧设计 陈 斐

责任编辑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mm×960 mm 1/16

印 张 296 插页 40

字 数 3450 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780-6

定 价 680.00 元(共10册·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前言

i

本书由三章构成：“文明与万国公法”、“法国革命与中国”、“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这三章均以从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初约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因此，简而言之，本书所论述的是属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这一学科领域的内容。

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向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朝贡体制和王朝体制在中国都具有两千年的历史，即使仅就其转换成异质的条约体制和共和体制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也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这些问题是这三章所要解决的共同的主题。换言之，这三章是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解决上述共同的课题。

对世界认识的转换也可以说是文明观的转换。因为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的核心，是只有中国文明才配称为“文明”，他们确信世界仅仅只有这样一种文明。在朝贡体制或士人统治等旧体制的中国，秩序的基本构架都与这种文明观具有深刻的关联。因而，不论有关西洋诸国的信息量如何增加，只要知识分子内心深处 ii

的这种文明观的根底不发生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就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

以中国文明的优越性认识为中心的文明观,常常被称为“中华思想”。人们常常将它作为夜郎自大、自我中心的见解来加以揶揄或批判。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这样自我解嘲了。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从中国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学术的深厚积蓄,以及到18世纪后半期中国在政治或经济能力方面还保持有高度的水准来考虑,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性的确信,毋宁说是当然的事。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为“中华思想”的文明观,至少在历史进程的某一时段之前,是具有充分的意义和根据的见解。这是贯穿本书的基本前提。

因为中华思想是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要进行自我克服就尤为困难。在近代中国文明观的转换过程中,西洋观(西洋文明观)的变化,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中国文明观的变化的又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这样,对具有较强的普遍主义志向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两种变化是决不可以分割开来的单一性的存在。相反,他们每次都要在使两者不断地关联交织中,重新构筑对世界的认识。换言之,他们没有,原本也不可能在“文明开化”之名下破除传统的文明观。因此,他们的文明观的转换,乍一看显得有些迟缓。甚至有的观点认为,到19世纪后半期中华思想毋宁说更加强化了。但是这种迟缓,笔者认为与其说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偏见或怠慢所致,毋宁说正表明了承担膨大的文明积蓄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的精神葛藤。

iii 如洋葱拨皮层层无尽,近代中国文明观的转换,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也是这样一种无尽自我解剖的过程,至少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指向某一特定目标的过程来叙述。在每章中,我尽可能多地采纳与各章主题相关的被认为有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特别是注意到其言说的逻辑结构及其默认的前提,并且尽可能对他们的思想作内在的分析。至少我不想对他们只是以贴上“进步”或“反动”这样简单的标签了事。

每章所涉及的时代以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初为主要对象。但是,中国文明观的转换过程,并不是在这一时期就完成了,而是在此后还在继续,特别是 19 世纪后半期展开的文明观转换的历史剧在 20 世纪后半期又有再现——虽然有大幅度的变化——的迹象。因而在每章中,以“此后的问题”的形式,试图追踪这些问题到现代是如何展开的。

与第一、二、三章相比,序章的性质稍微有些不同。第一至第三章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为素材,着重叙述其思想内容的变化。相比之下,序章则着重叙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变化。另外,第一至第三章均是以曾经发表过的论文为底本,而序章是为本书新写的。这一序章的设置,是为那些非中国思想或中国史专业的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提供被称为“士大夫”的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程度的预备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其他篇章而写作的。士大夫,恐怕从世界史的视野来看也是一种独特的存在。用我们通常持有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评价他们的思想或行动,那大概就错了。

目 录

iv

前 言 / 1

序 章 近代中国与知识分子 / 1

一位老学者 / 1

士大夫与中国的近代化 / 7

科举的废止与新知识分子的诞生 / 14

士大夫与知识阶层 / 19

小结 / 25

主要参考文献 / 30

第一章 文明与万国公法 / 32

引言 / 32

一 不平等条约 / 34

《万国公法》与不平等条约 / 34

中华文明与不平等条约 / 38

二 《万国公法》的翻译 / 44

总理衙门首脑的反应 / 44

附会论与万国公法 / 49

三 外交官与万国公法 / 57

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 / 57

- 中国的薛福成 / 60
- 欧洲的薛福成 / 63
- 四 变法运动与万国公法 / 71
 - 甲午战争失败的冲击与万国公法 / 71
 - 变法派的理论结构 / 75
 - 孔子与格罗修斯 / 83
 - “三世进化”说与社会进化论 / 91
- 五 中国革命与万国公法 / 100
 - “文明之革命”与“文明之排外” / 100
 - 希望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命 / 107
 - 政治犯与国际法 / 113
 - 排外与国际法 / 116
- 六 不平等条约解除的历史 / 124
 - 辛亥革命 / 125
 -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 / 129
 - 国民革命与关税自主权的恢复 / 134
 - 抗日战争与治外法权的撤销 / 138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新的不平等关系 / 139
 - 向激进路线的转换 / 144
 - 邓小平路线与香港问题 / 147
- 小结 / 150
- 主要参考文献 / 172

第二章 法国革命与中国 / 175

引言 / 175

一 前史 / 178

- 最初的法国革命介绍 / 178
- 微不足道之国 / 180
- 法国史与法国革命 / 183

- 二 法国革命论的展开 / 188
 - 康有为的《法国革命记》 / 189
 - 梁启超之迷惑 / 191
 - 革命派的法国革命论的出现 / 194
 - 论争 / 198
 - 调侃与恫吓 / 203
- 三 法国革命论的论争 / 205
 - 论争一：进化与革命 / 205
 - 论争二：专制与革命 / 206
 - 论争三：民主与革命 / 209
 - 论争四：革命与国际环境 / 210
- 四 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 / 213
 - 陈独秀与法国革命再评价 / 214
 - 社会革命论的谱系 / 215
 - 自由与面包 / 217
 - 从法国革命到法国文化 / 219
- 小结 / 221

vi

第三章 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 / 231

- 一 体制构想的历史射程 / 231
 - 最初的体制选择 / 231
 - 第二次划时代的选择 / 232
 - 语汇的变化 / 234
 - 各种各样的体制构想 / 235
 - 围绕专制的一致性认识 / 236
 - 对专制的不同评价 / 237
- 二 世界史与中国的专制 / 238
 - 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 / 238
 - 从君主之国到君主专制 / 240

从政体类型论到政体进化论 / 243

三 专制与自由 / 245

共和制与立宪君主制的论争 / 245

初期革命派的自由观 / 247

天赋的自由与强者的自由 / 249

文明的自由与野蛮的自由 / 251

直接的专制与间接的专制 / 252

自由精神与奴隶根性 / 254

再论革命派的自由观 / 256

小结 / 259

补论 / 262

1. 无政府主义者的专制论 / 262

2. 严复的《政治讲义》与专制论 / 267

主要参考文献 / 272

后 记 / 274

译后记 / 279

一位老学者

时值 1928 年 4 月。

在当时的北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日本外务省以义和团赔偿金于 1925 年设立的中日共同参与的学术委员会)正致力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四库全书》是受乾隆帝敕命网罗中国古今重要书籍而编成的中国史上最大的丛书。收入《四库全书》的每一册图书都有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 卷,1782 年刊)即是此提要的集大成者。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所致力《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乃是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续,欲将《四库全书》编纂之后刊行的所有重要的书籍逐一解题并编纂结集。这是一项宏伟的计划。

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中心人物是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长柯劭忞(1850—1933)。他 1886 年进士出身,任过湖南学政等职,民国之后从政界隐身,专致于学术活动。他的主要学术业绩,除了作为清史馆的馆长参与《清史稿》(536 卷,1927 年完成)的编纂之外,还补正正史《元史》的谬误与疏漏而著成《新元史》(257 卷,1927 年完成)。要而言之,他是当时中国传统学术的最高权威之一。

以清朝遗老自封的 78 岁的柯劭忞,依照清朝的风俗还留着发辫。4 他在一次编辑会议上郑重地提出了下面的提案:《四库全书》中只收录

中国的书籍,据说西方各国近来学问也有很大的进步,这次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收录一些西方蛮夷的著作不好吗?

贝塚茂树在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由狩野直喜介绍访问北京并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他在以《老北京人》(收入《古代的复活》,讲谈社,1971年)为题的一篇随笔中留下的一段插曲。这一年是1928年,即民国17年。这一年离清朝灭亡、亚洲最初的共和国诞生已经有16年的岁月了。在这一年前的夏天,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国共合作分裂了;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宣告中国再统一的完成,是在这一年的7月。在这样的年代,在北京,还有这样的人物存在。

对柯劭忞的言行,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如何评价呢?

严复(1854—1921)的《天演论》是最初将西洋学术介绍到中国的著作,刊行于1898年,到1928年已经过去了30年。这30年间大量的西洋书籍被译介,知识分子的世界中西洋学术的影响力总的说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早在20世纪初,社会进化论十分流行,“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从日本传来的进化论用语渗透到日常用语的层面。另一方面,与西洋学术的影响力增大相反,传统学术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则每况愈下。特别是在1910年代后半期以标榜“科学”与“民主”而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中,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学术被作为反“科学”与“民主”的对象而遭到全面的批判。到20年代后半期,知识分子所用的概念或方法已经深受西洋学术的影响,西洋学术的影响力

5 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似乎遥遥凌驾在传统学术之上。

学术界的变化在柯劭忞得意的史学领域最为显著。这是因为在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史界革命”以来,寻求中国变革的人们,不仅仅要求变革中国的现状,而且也力图变更或修正对既往的中国历史的解释。到了20世纪20年代,接受西方史学方法的历史学者,实际上已经开始用新的立场或观点来研究中国通史或专门史。例如,1910年代留学于美国、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教学工作的何炳松(1890—1946),在介绍罗宾逊的《新史学》的同时,提倡将自政治以至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内容均纳入史学视野的作为科学的历史学,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24年,他移籍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刊行了

其亲自编纂的《中国史学丛书》。还比如,陶希圣(1899—1988)在1928年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这是以马克思的发展阶段论的架构分析中国历史的最初尝试,也是20世纪30年代展开的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争”的导火线之一。不是叙述个人或王朝的事迹,而是用新的方法回答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这一问题,成了许多历史学者所考虑的对象。

将柯劭忞置身于这样的学术潮流中,可见他的确是那种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了。他对于西方学术的知识还不及同时代中学生的水平,毋宁说几近于无知。而且,他编纂的《清史稿》与《新元史》,都是承袭纪传体的断代史这一传统的史书编纂体例。这种以个人或王朝的事迹为中心的史书编纂体例,已经成为20世纪初提倡的“史界革命”以来一贯批判的对象,因而终究不能满足20年代“新史学”的学术水准的要求。如此说来,乍一看,给柯劭忞贴上“时代错误”或“顽迷固陋”之类的标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6

多数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企图以西洋学术为武器来进行中国的变革。既有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国民国家理论来进行政治变革的,也有信奉实用主义以教育改革为目标的,还有赞成无政府主义、主张通过“勤工俭学”来实现社会改造的。其立场与方法虽然各种各样,但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传统与现实,根据西方学术所提供的药方来进行中国的变革,这是他们的共同志向。与这种知识分子相比较,柯劭忞的立场显得与众不同。对他而言,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不管从哪个角度都看不出变革的意向。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北京,后脑勺上还按照清朝的旧俗留着发辫,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表明其背离变革的生活态度。如果认为具有变革志向的知识分子是“进步的”的话,那么柯劭忞就是“反动的”。换言之,在承认西方社会的先进性、以西方社会为基准来评价中国的事情这一点上,如果将具有变革志向的知识分子的态度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那么柯劭忞就是“中国中心主义”。

但是,“反动的”或“中国中心主义”这种评价,对柯劭忞的思想而言真的适当吗?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的确有与“反动的”或“中国中

心主义”的评价相称的知识分子。比如,在 20 年代前半期,以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优劣为主题而展开的“东西文化论争”和“科学与人生观论争”等激烈论争,就有许多知识分子不断卷入。对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用“反动的”或“中国中心主义”加以评价很难说完全不当。因为他们的基本立场明确地具有对新文化运动急进的反传统主义的“反动”意向。1910 年代后半期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全面否定以儒教为首的中国旧文化,主张构筑立足于“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强调文化改造的必要性。企图制止这种“过激”倾向的人们,一方面着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祸,强调以科学为中心的西洋“机械文明”的末路与界限;另一方面,强调在“精神文明”方面中国的优越性而展开对儒教的再评价。常常被称为“新儒家”的那些人,主张中国应该沿着不同于西洋的中国固有的道路前进。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的态度是“中国中心主义”的。

新儒家与柯劭忞的态度虽然在表面上看十分类似,但是其根底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新儒家与柯劭忞在尊重中国文明这种态度上虽然是共同的,但是,在柯劭忞那里看不到像新儒家那样有意识地对抗西方文明的姿态。柯劭忞提出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收录一些西方蛮夷的著作不好吗”这一提案,并不是有意识地要蔑视西洋学术。他的心底,不是对西洋学术的蔑视,而是对其不关心。部分新儒家学习西洋的观念论哲学,运用其范畴和观念对儒教进行再评价,在此基础上批判西洋文明。相对而言,柯劭忞只关中国的学术。对处于他关心之外的西洋学术,既不有意识地表示共鸣,也不有意识地表示对抗。对一些不时进入他视野的西洋学术著作,如果它优秀,他便提议应该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并不表示他傲慢,毋宁说表示他的理智的诚实性。

再进一步,虽然新儒家与柯劭忞都与急进的变革背道而驰,但是,在柯劭忞那里看不出新儒家那样有意识地与急进的变革相对抗的姿态。恪守旧学的学问规范并留着发辫的柯劭忞,并不是选择了对新文化有意识地批判的态度。存在于他的内心深处的,是与其周围进行的剧烈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并无关系,却贯穿于他个人的学问世界与

生活习惯中的意志。这不是对急进的变革的反抗,而是对它不关心。新儒家则是力图动员传统学术来抑制急进的变革。这与变革派以西方学术作为急进变革的武器有相为表里的关系。虽然政治立场正好相反,但是将学术动员进政治的世界视为当然,这一点他们是完全相通的。与之相对,柯劭忞是将学问的世界视为自我俱足的世界,不论是急进的变革还是对变革的抑制,他拒绝将学问的世界与政治的世界联系起来。

如上所述,1920年代是西方学术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时代,也是如同国民革命那样政治性动荡不断持续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像柯劭忞这样既不关心西洋学术也不关心政治世界,这种双重的漠不关心,乃是一种极为奇异的态度,其本身就值得惊叹。问题是,他的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是如何产生的?

柯劭忞对西方学术不关心的背后是对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确信。中国传统学术具有超长期的历史和浩繁的文字记载的积蓄。对柯劭忞而言,作为学者应该学习的必要且足够的东西都已经包含在这种浩繁的积蓄中。

如果正言厉色地问:西洋学术难道毫无可学之处吗?柯劭忞的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在柯劭忞那里,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作有意的区分,这种意识本来就很淡漠。而且,自觉地以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学问的意识也很淡漠。也就是说,在其学问动机中民族主义的自觉很淡薄。在他的意识中,学问本来就是超越民族或地域的差别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即使是西洋的书籍,只要可取,就应该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中。这种意识就是他这一提案的根据。反过来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目的在于网罗具有学术性价值的著作,而不仅仅是为了网罗中国人的著作。即使中国人的著作占绝大多数,这种结果也纯粹是由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积累之厚及水准之高所致。

尽管如此,对柯劭忞而言,即使他承认西洋学术有某些可取之处,他自身应该不会觉得有学习它的必要。关于人或社会存在的真理,如果通过中国传统学术的积蓄能够把握的话,便没有特意去向西洋学术

寻求的必要。即便倾其一生,一个人也不可能触及中国学术浩繁积蓄的全貌。既然如此,利用全部有限的时间去研究传统的学术,这才是他所认为的学者的使命。

而且,对柯劭忞而言,中国的传统学术并不单是学习的对象。对后世学者,中国的传统学术不是一个封闭的完结体,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例如,在经学领域,学者可以对经书进行再解释;在史学领域,学者或补正旧史书或撰写新史书。这样,进入传统学术庞大积蓄中的学者,如果发现其中有不完备或不充分之处,便力求以自己的力量弥其不备、补其不足,从而为进一步完善传统学术作出贡献。柯劭忞发现了明代编纂的《元史》中有许多不足之处,因而感到有必要著一本《新元史》。一个王朝灭亡之后,必修其正史。他就是编纂《清史稿》的负责人。柯劭忞并不是把中国的传统学术视为走向死亡的过去的遗产,而是认为它依然具有生命活力,并且应该继承和发展。

- 继承中国传统学术当然包括沿袭其形式。因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其高度的形式性。就像在古典诗文领域中所见的那种典型,中国传统学术将形式提升为规范,其规范由共有的人们所承担。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不断地在规范的高度制约中表现其知性或感性,从而发挥自己的独创性。反过来说,只要能够遵守规范,就有担当传承中国学术传统的可能。这样的人,并没有将其限定为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民族的理由。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传统学术越过了中国的境域传播到东亚世界,为不同的世代或时代所传承。对柯劭忞而言,
- 10 正确地继承学术的规范正是继承传统学术不可缺少的事情。可以说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社会角色的最低要求。因此,传统学术这样才有可能为下一代所继承。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或《清史稿》是正史或准正史著作。正史,有《史记》、《汉书》以来的传统,有一贯继承的形式。纪传体的断代史这种编纂方法就是一贯沿袭而来的一种形式。不论这种形式在“史界革命”中遭到如何的非难以及持“新史学”立场的学者如何视之为时代错误,对柯劭忞来说,这依然是不能不遵守的形式。这中间本来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柯劭忞就生活在形式或规范一贯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世界中。这